

# 变迁中的 云南少数民族 乡村政治



全书选择云南边疆多民族地区壮族、傣族、白族、回族、佤族、藏族、彝族聚居的十几个村社为研究对象，对村级基层政治组织、村民自治、政治关系、权力结构、权威类型、政治生活运行状况等主题进行实证调查研究，分析了民族村社政治生活的诸多问题，并提出了村级治理以及建构和谐村社政治生活的思路和建议。

周俊华 等 /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 主要作者简介

周俊华，1965年4月出生于云南丽江市华坪县。汉族，中共党员，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制度史、民族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等教学与研究。1985年于云南大学获得哲学学士学位，2005年于清华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2007年于云南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出版专著《纳西族传统政治文化史论》，合著《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政治组织形式和制度的变迁》，主编、参编过多本著作，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主持参与过多项课题研究。

本书由云南大学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院  
(中国陆地边疆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资助出版

# 变迁中的 云南少数民族 乡村政治

周俊华 等 /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迁中的云南少数民族乡村政治 / 周俊华等著.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482-2386-3

I. ①变… II. ①周… III. ①民族地区—农村—政治  
生活—研究—云南省 IV. ①D42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0680号

出品人: 周永坤

策划: 张丽华

责任编辑: 李红

装帧设计: 刘雨

# 变迁中的 云南少数民族 乡村政治

周俊华 等 /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装: 昆明研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0

字数: 381千

版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82-2386-3

定价: 38.00元

社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 650091

电话: (0871) 65031071 65033244

网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mailto:market@ynup.com)



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龙营村村貌（何志斌 摄）



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龙营村村民焦急等待村委会选举计票结果  
（何志斌 摄）



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龙营村村民认真听取村委会工作情况汇报  
(何志斌 摄)



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白族“念佛会” (何志斌 摄)



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白石谷村村民委员会（马积霞 摄）



澜沧雪林佤族传统茅草屋（舒琴 摄）



普洱市孟连县勐马镇勐马村委会（刀丽凤 摄）



普洱市孟连县孟连宣抚司正门（刀丽凤 摄）



昭通市守望乡营盘村（马陪艳 摄）



昭通市守望乡营盘村（马陪艳 摄）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马  
洒村壮族老人亭  
(田发彪 摄)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马  
洒村壮族老人亭碑记  
(田发彪 摄)

## 传承魁阁精神 重视乡土研究（代序）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方几所大学迁至云南昆明。费孝通先生创立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工作地点选在昆明呈贡县城的“魁星阁”，简称“魁阁”。时值烽火连天、国土沦散、物资和书籍奇缺、资金严重匮乏，但就是在这艰苦的年代里，费孝通先生带领一批学术精英和青年才俊，为中国的富强而忘我工作，形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学者团体，开展了一系列社区调查工作，产生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经典之作，他们的道德水准和科学风范，被世人赞誉为“魁阁精神”。

概而言之，“魁阁精神”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自由研究的风气甚浓。费孝通先生对研究工作的重心虽然有一连串的计划，可是对于研究的题材并不加以严格的限制，他鼓励每一个人去创造或发掘，而且完全根据个人的兴趣，绝不强迫他们去做自己没有兴趣的工作。二是尊重个人的表现，开展公开的辩论。费孝通总是鼓励青年学者自己研究，自己思想，自己发表，以磨炼自己。而他总是极诚恳地站在旁边指导他们、帮助他们，从诱导思想到改正写作，他热望别人成功，认为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的成功。在魁阁，研究者选定自己的课题后在讨论会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意见，公开征求别人的意见，每个人都可以无所顾忌地提出中肯的批评。费孝通先生虽然身居领导地位，可是也一样接受青年朋友的批评。三是注重乡土社会的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外辱内患的危亡中，开始有知识分子“自上而下”莅临呈贡魁星阁，关注中国乡土社会研究的案例，无论是最早发现呈贡魁星阁的陶云逵，还是租下魁星阁作为社会学的实地调查工作基地的费孝通，以及从1940年到1945年先后在这里工作过的田汝康、张之毅、史国衡、谷苞、许光、李有义、胡庆钧等学者，尽管研究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总体上都是对农村政治经济生活、基层社区、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城乡关系、农村与工厂之间的关系等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和深入探讨，产生的成果主要聚焦于乡土社会，如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史国衡的《昆长劳工》，谷苞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的研究》《洱村小农经济的研究》，田汝康的《芒市

边民的摆》和《内地女工》，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的研究》等，形成了魁阁聚焦于乡土社会的研究风范。在这一批深入的人类学实地研究成果之上，基于那个时期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思考，费孝通先生又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先后撰写了《乡土中国》《中国士绅》等作品，这一系列理论著作奠定了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人类学关注中国乡土社会及其结构，注重“上下关系”、差序格局等的研究理路和风格，开创了中国学界重视农村社会研究的学术传统。四是伙伴精神或者说团队精神。魁阁的每个研究者都是这个团体的忠实伙伴，他们有同甘共苦的精神。由于经费困难，“魁阁”没有事务人员，从经营公款到购买文具，从写钢板字到用油印机都须自己动手。魁阁出版的油印报告，都是他们自己动手写、自己印的。正是由于这种伙伴精神才使“魁阁”的学术研究坚持下来，并取得卓越的成就。五是“传、帮、带”的培养方式。费孝通先生在魁阁团队的培养中功劳卓著，魁阁招纳年青一代的学者，费先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新手”，而魁阁培养年轻学者的方法就是“传、帮、带”，“亲自带着走，亲自带着看”。在魁阁，费孝通先生给自己的定位是“魁阁的总助手”，召集讨论，帮研究人员写作，甚至帮助他们刻钢板和油印等（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经魁阁的培养，产生一批成果，也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学者。

“魁阁精神”示范了高水平学术集团形成应有的学风、学术环境和具体路径，为后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启发和鼓励，影响着一批又一批中国学人，至今仍光芒闪耀，令后学可望而不可即。今云南大学政治学人周俊华及其研究团队在云南大学呈贡校区完成的新作《变迁中的云南少数民族乡村政治》[这个团队2013年已在呈贡校区完成《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政治组织形式和制度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并获得云南省第18次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正是在魁阁精神的启发下师生共同完成了关于云南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的研究成果。

该书洋洋二十多万言，选择云南边疆多民族地区壮族、傣族、白族、回族、佤族、藏族、彝族聚居的十几个村社为研究对象，对村社基层政治组织、村民自治、政治关系、权力结构、权威类型、政治生活运行状况等主题进行实证调查研究，分析了民族村社政治生活的诸多问题，并尝试提出了建构和谐村社政治生活的思路和途径。毫无疑问，该书是研究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的一个可喜可贺的重要收获，丰富了学界乡村治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了解当下云南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生活提供了诸多个案。作为俊华的博导，看到其长期执着于学术探索，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致力于培养一个个年轻学子，内心是欣喜的。俊华邀我为《变迁中的云南少数民族乡村政治》写序，

然仓促阅读书稿，只能浮光掠影浅谈一些粗略印象。总的来讲，这本书有以下几个颇值得注意的突出特点：

其一，师生共同探讨，注重田野调查。在研究过程中，俊华作为研究团队的主持人，召集研究团队积极探讨，结合不同团队成员的兴趣专长，有意协调引导少数民族研究生独立研究他（她）自己本民族，田野调查点就选取自己所熟悉的从小生长于斯的民族村社，通过科学分工对云南的壮族、傣族、白族、回族、佤族、藏族、彝族等7个少数民族农村基层政治生活某些方面或主题开展专项调查研究，以掌握的第一手实证数据为描述和分析问题的依据，然后经具体讨论修改定稿形成专项研究报告，呈现出变迁中的云南少数民族乡村基层政治生活的状况。从主题的创意、田野点的选择、问卷的设计及修改、调查报告数据的统计、研究报告的撰写等诸多环节都是师生共同探讨完成，传承着魁阁民主、自由、平等、参与、理论联系实际、注重乡土研究的精神和学风，是魁阁精神在呈贡校园的延续，为今天呈贡大学校园师生共学共勉、自由研究的学术空气增添着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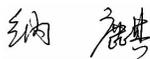
其二，《变迁中的云南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以民族政治学的理论成果为基础，综合借鉴了国内外乡村政治研究的成果。国内外民族政治学的体系化论著以及近些年来学界对少数民族政治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俊华及其研究团队研究少数民族农村基层政治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基本分析框架。同时，《变迁中的云南少数民族乡村政治》注重从国外学者对中国乡村政治的相关研究探寻基本的研究理路，从国内学者对乡村政治的众多研究成果获得启发。例如，由于研究者热爱自己长大的村落、生活场景、文化和传统，对家乡有深厚的感情，理性与感性交织的认知和思想，能够充分发挥研究者的亲身经历、体验、观察、民族情感和调查便利等优势，使研究更能接近研究对象本身，对民族村社政治生活的描述更加真实、生动、细腻和准确，较多地体现了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特点。

其三，我以为《变迁中的少数民族乡村政治》重视乡土研究，聚焦村级治理，对建设美丽乡村意义重大。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关键取决于乡村建设的成败，这已成为不争的共识。而乡村最重要、最核心的价值便是文化价值，乡村建设最根本、最基础的任务也应该是文化建设。毋庸置疑，乡村政治也正是文化建设这一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俊华及其研究团队重视乡土研究，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村级治理，以认真、热情和严谨的态度，每一个专题都立足于实际基层政治生活的系统深入考察，历时性地梳理不同阶段的乡村政治发展，客观描述变迁中的云南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生活，并尝试性地做出分析和形成结论。这种探索对于破解如何推进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探讨

村级治理中的现实问题将不无裨益，从更长远看对建设美丽乡村意义重大。

当然，这并不是说《变迁中的云南少数民族乡村政治》已完美无缺，至全至善。世间学问从来没有止境，学术研究亦不可能穷尽，但任何的苛求都不免失之天真，更何况，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只能是一家之言。《变迁中的云南少数民族乡村政治》是为发挥研究团队的优势，选择云南7个少数民族的15个村社，并就其村社政治生活的某一方面或主题进行调查研究，其研究的民族村社只是云南千万个民族村社中的代表，研究的问题也只是农村基层政治生活的局部，存在微观性和有限性，就每一专题研究的问题而言，疏漏和认知的局限也可能在所难免。对此，相信读者自能识别分辨。但我不想求全责备，以致向俊华带领的年轻团队提出过分要求，团队也需要成长的时间。在此，我衷心地向俊华及其研究团队表示祝贺。这部《变迁中的云南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的形成来之不易，毕竟，在调查经费缺乏、学习工作都很紧张的情况下，要花费时间跋山涉水去调查十几个民族村社，精神是可嘉的。尤其作为这些研究团队成员的导师，从策划研究任务，培养研究生的研究素质和能力，构思主题和研究步骤，设计调查问卷，一直到派出调查者，安排吃住行，完成调查任务平安归来，撰稿、修改、编排、出版等具体工作，俊华都花费了较多的心血，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也包括承担的责任和风险。这是培养人才的辛劳，是传道授业的可敬。从中可以看到，我们一代一代的教师不断成长起来，魁阁精神也在师生之间、在校园、在田野调查中延续着。因此，一部学术成果的学术意义及价值，不仅在于学术研究的成果，更在于探索学术的研究过程。

原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2015年6月30日于云南建水正明苑

# 前 言

本书选择云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壮族、傣族、白族、回族、佤族、藏族、彝族村社，对村社基层政治组织、村民自治、政治关系、权力结构、权威类型、政治生活运行状况等进行实证调查研究，分析了民族村社政治生活的诸多问题，并提出建构和谐村社政治生活的思路和途径。

## 一、研究边疆多民族地区农村政治生活的意义

边疆多民族地区农村政治生活是我国农村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乡村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离开乡村政治视野，国家关于农村的各项发展战略，农村的经济改革和文化发展、各项政策和具体措施都将难以贯彻执行。

对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生活的研究有助于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十八大”都明确提出要把发展基层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民主政治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不仅取决于国家政权的制度设计，而且也取决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实施。对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摸清少数民族农村基层政治生活的真实状况，基层民主建设的水平、运行情况、存在问题、影响制约因素，基层民众的政治素质、政治心理、政治参与能力、政治需求和利益趋向，从而为农村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依据。农村基层社会尤其是“村”处于中国农村社会的末端，研究社会末端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国家宏观的政治体系、方针政策、经济文化建设等辐射、推进到基层的时候，实效究竟如何、可及性的大小等问题。

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主要通过少数民族村社政治关系表现出来。“少数民族政治关系是少数民族政治生活的基本架构。”<sup>①</sup>“政治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基于社会利益要求和利益关系而形成的，以政治的强制力量和政治权利分

---

<sup>①</sup> 周平：《中国少数民族政治分析》，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配为特征的社会关系。”<sup>①</sup> 政治关系是人类社会政治的一般本质内容，其他政治现象则是政治关系的外化和具体形态的表现，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也必然要表现为人类社会政治的发展和变化。同样，少数民族政治关系是少数民族在政治生活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它有着复杂的机理结构，且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是对少数民族政治生活最为真实的写照。因此，研究分析少数民族的政治关系对我们了解、把握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生活的全貌有着极为深远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 二、学界相关乡村政治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

(一) 国外学者对中国乡村政治的相关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研究理路

20世纪以来，国外学者运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视角和方法对中国的乡村政治及其地方秩序进行研究。如美国学者孔飞力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1990年）中指出，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有其很深的社会制度根基，这就是由名流（士绅）操纵的政治生活，名流凭借他们的身份、财富和关系操纵地方事务。美国学者黄宗智则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6年）中对村庄社会变迁的国家政治环境进行了独到的解析，分析了现代化所导致的国家权力的扩张对新型的国家与村庄社会关系产生的影响，认为考察中国农村政治结构，应该考虑一个涉及国家、士绅和村庄三方面的三角结构。美国学者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2008年）一书中，探讨了村落中的政治权力与文化网络的脱节过程，分析了20世纪初国家在基层乡村合法性丧失的原因并提出了“经纪”模型，指出国家代理人的权力异化导致农民的反抗，农民所凭借的力量是由“权力的文化网络”所编织起来的跨村民间组织。美国学者萧凤霞在《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乡村革命的协从》（2001年）一文中认为，近代以来的国家政权，通过培植和拉拢地方精英并把这些地方精英吸纳到国家势力控制范围，利用他们的关系网络来控制乡村社会，从而使得国家行政权力不断延伸下去，村庄也就成了被国家控制的政治单位或“细胞组织”，从而造成了农村社区国家化的倾向。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在其《社会权力的来源》（2002年）中分析了村落共同体秩序的价值，认为村落推动了国家权力和政治生活。威廉·韩丁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1966年）和《深翻：一个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1983年），如此等等，国外学者对中国社会乡村政治的研究体现出几个基本的特点，一是

<sup>①</sup>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综合运用于中国乡村政治研究，使分析具有敏锐、广阔、细致、入微等特点；二是既有宏观的自上而下的纵向层面的结构分析，又有横断面上的深刻解剖和挖掘。这些研究的方法、理路可以说影响、形塑了国内学者研究乡村政治的某些风格。本书也注意吸纳这样的研究方法，在对边疆多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政治生活的个案研究中，在政治学、民族政治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有所借鉴，力求通过研究者的亲身观察体验、调查研究和理论分析，对村社政治生活既有理论性、实证性的分析，又有具体入微的细致描述。

## （二）国内学者对乡村政治的众多研究成果给予我们理论指导与启发

国内学者关于乡村政治的研究成果众多。如费孝通先生早期的《江村经济》（1986年）是研究中国乡村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经典之作，其后的《乡土中国》（1985年）、《中国绅士》（2006年）也都是乡村政治研究的重要成果。贺雪峰《乡村治理与秩序——村治论文集》（2003年）、《新乡土中国》（2003年）、《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2003年）、《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2006年）对乡村治理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徐勇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1992年）、《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997年）、《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2003年）对村民自治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研究。吴毅的博士论文《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2002年）从影响20世纪双村权威和秩序形态的三大基本变量即现代性、国家和地方性知识入手，描述、分析了该村的政治权威和秩序的变迁。于建嵘在《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2001年）一书中认为乡村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是，随着国家对乡村经济依赖性的减弱和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传统权力文化向现代权利文化的转变，国家行政权力将逐渐退出乡村政治领域，乡村社会将会最终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实现从传统的专制家族社会向现代民主的个体社会的转型。此外，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1998年），王晓毅编的《血缘与地缘》（1993年）以及张静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2000年），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2001年），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02年），王庆五、董明磊的《治理方式的变革与江苏农村现代化——江苏省村民自治区域比较研究》（2003年），王铭铭的《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2004年），尹焕兰的《村民自治面临的社会焦点问题透析——对全国第一个村民自治示范县的追踪考察》（2004年）等等，成果很丰富，在此不一一列举。

学术界围绕乡村政治研究发表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如吴理财的《村民